

一方的误解和错觉带来的恐日感，最后发展到排日、抗日，因思想倾向而想象为是一种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之间的对立。结果使得支那大陆的三千余万回教徒，尸横遍野、气息奄奄，一直处于被压迫的境地。”¹

说卢沟桥事变来自于中国人对日本的误解，这当然是佐久间的一面之词。但他毕竟说出了一些事实真相：如果为侵略战争所利用，最后付出惨痛代价的，的确只能是“回教徒”自身。就像对外高喊着支持蒙古民族解放，私下里却千方百计阻止一样，² 日本在战争期间之所以关心中国的“回教徒”，只是为了帮助推进侵略战争，丝毫没有帮助“回教徒”的目的，这是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

结语

1938年7月，日本前驻外特命全权公使笠间晃雄在日本外交协会第266次例会上发表了《时局与回教》的演讲，他根据自己作为日本代表在土耳其、波斯、阿拉伯、埃及等国工作过的经验，针对当时日本国内的伊斯兰教热，就“回教工作”背后隐藏着的日本人以为自己才是伊斯兰教社会救星的想法，进行了严厉批评：“大家都以为不仅是支那的回教徒，甚至世界上所有的回教徒都在仰仗着日本人，希望得到一些什么帮助。而事实上，这些民族并没有仰望东方，借助日本的力量恢复民族独立的想法。都说日本是东洋的盟主，（日本——引者）自己也确实有做盟主的心情，但是对方并没有请求（日本——引者）一定担任这一角色。关于这一点，如不清楚认识，将来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事情。之所以会成这样，完全是来自于日本人至今为止的傲慢。”³

其实，日本在中国的“回教工作”遇到了许多中国“回教徒”的抵制。但是为推进侵略战争，日本军方发动宣传工具大肆鼓吹“回教工作”的成就，实是自欺欺人。例如，在“在北京茂川机关”的指导下为日本侵略战争摇旗呐喊的“中国回教总联合会”，就被宣传为是一个极为活跃的“回教”团体。可事实上，在一位冷静的日本外交官眼里，那里不过是一片“门前罗雀的回教联合委员会”的景象。⁴

“回教工作”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帮助了日本的侵华战争？日本的关心究竟蒙蔽了多少“回教徒”，实在值得怀疑。然而，日本为什么会产生在侵略战争中利用“回教工作”的念头，却值得深思。毫无疑问，侵略者们曾经认为，如果能够制造一个“共同的回教空间”，就能够覆盖住中国“回教徒”的“国家意识”；在此基础上，如果能够让“回教徒”们以为日本理解、同情并且会保护“回教”和“回教徒”，他们就可以更加容易地跨越被侵略国家的门槛，并且达到占领或分裂中国的目的。但是，侵略者们忽视了一点，那就是广大伊斯兰教信众作为中华民族的重要成员，向来都是反对外来侵略的，而他们自己在主动接触“回教”和“回教徒”时却明显地带着日本国家色彩和侵略目的，因此，真正信任日本的中国“回教徒”并没有几人，“回教工作”在进入1940年代以后也渐趋式微。尽管如此，受到刺激的中国国民政府，也不得不针对边疆民族和信仰伊斯兰教民族集团，发起了新一轮确认近代国家主权范围、建设中华民族国家的运动。⁵

¹ 佐久間貞次郎：《回教の動き》，東京：春日書房，1938年9月，85頁。

² 《對蒙政策要綱》，昭和十三年十月一日，外務省記錄/A門 政治、外交/1類 帝国外交/1項 對支那國/支那事變關係一件 第十八卷28。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JACAR系統查詢編碼B02030550400。

³ 《時局と回教》，昭和十三年十月，外務省記錄/A門 政治、外交/3類 宣傳/3項 啓発/本邦對內啓発關係雜件/講演關係/日本外交協會講演集 第五卷71。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JACAR系統查詢編碼B02030922100，文件名為《時局と回教(前特命全權公使、笠間晃雄)》。

⁴ 《濟南兗閣下宛電報第五二號ニ関シ》，昭和十五年二月十六日，外務省記錄/I門 文化、宗教、衛生、労働及社會問題/2類 宗教、神社、寺院、教會/各國ニ於ケル宗教及布教關係雜件/回教關係 第二卷3. 中國分割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JACAR系統查詢編碼B04012550500。

⁵ 《白崇禧ノ日本軍西北工作妨害》，內閣/各種情報資料/各種情報資料/各種情報資料·支那事變ニ関スル各國新聞論調概要。JACAR系統查詢編碼A03024015400，國立公文書館所藏。該文件未註明時間，但是從本文內容及同卷前後排列其他文書上來看，應該是昭和十三年五月間的檔案——引者。該資料在JACAR系統上文件名為《米國 白崇禧ノ日本軍西北工作妨害》。

【论 文】

20 世纪上半期日本的中国回教民族政策述论¹

曾凡云²

【摘要】 利用民族问题“肢解”中国，历来是日本侵略中国的一贯政策。进入 20 世纪后，日本人“独具只眼”，看出了中国回教民族对于实现其“东亚政策”的重要性。因此日本各界不遗余力，纷纷起来调查研究中国回教民族，在国内和中国建立了各种“回教”团体组织，利用种种借口分化、拉拢个别回教民族分裂分子，挑起民族矛盾，企图分裂中国，进而实现其征服中国的“东亚政策”。

【关键词】 日本；中国；回教民族；政策；述论

近代以来，日本侵略中国，其一贯手法就是在军事进攻的同时，辅以政治手段，即扶植傀儡或挑拨民族矛盾，从而达到“以华制华”之目的。因此扶植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建立傀儡政权、挑拨中国各民族间矛盾便成为实现其“东亚政策”的重要手段之一，“因为这些少数民族的运动对日本的军事行动、占领区的统治以及抵抗汉民族主义的斗争有着非同寻常的作用。”³ 在中国，由于回教民族⁴人口众多，分布广泛，所处地理位置又极其重要，而国民政府错误的民族政策又导致回汉两族之间矛盾不断，隔阂严重，这就使近代以来致力于“扬国威于四海，拓波涛于万里”的日本看出了“制定恰当的回教政策对于日本的东亚政策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⁵ 为此，日本政府和民间都不遗余力，在中国“回教”问题上下了功夫。关于 20 世纪上半期日本对中国回教民族政策的研究，学术界有了一定的成果，其中以王柯和安腾润一郎为代表⁶。他们主要依据日文档案资料为依据进行讨论，对中国大陆当时出版的伪回教组织出版的刊物很少利用，鉴于此，本文将把中文资料与日文资料结合起来对此再做一番探讨。

一、20 世纪上半期的日本对外“国策”与中国回教民族

明治维新后，随着近代天皇制的确立，日本对外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此后，日本政府的对外“国策”就是把明治天皇揭橥的“开拓万里之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总战略一步步付诸实施。进入 20 世纪后，日本在其“功利主义的亚洲外交战略”⁷指引下，开始把“经略大陆”这一“国策”付诸实施。为早日实现吞并中国，把“大陆政策”进一步向前推进的“宏愿”，日本一方面以武力为后盾，不断寻找借口，借以挑起战争，进而占领中国；另一方面则妄想以政治手段不战而控制全中国，即利用民族分化之方式，使各个民族分别独立，脱离中央政权，任其宰割，以实现其“经略大陆”这一重要“国策”。

¹ 本文刊载于《西北民族研究》2012 年第 1 期，第 104-114 页。文中黑体字为本《通讯》编者所加。

²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2010 级博士生。

³ [日]安腾润一郎，“Japan's ‘Hui-Muslim Campaigns’ in China from the 1910's to 1945”，《日本中东学会年报》2003，(18-2): 21.

⁴ 本文所谓的回教民族，是指当时日本对于中国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的称谓，在当时日本各种文献以及中国出版物中，对于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经常称呼为“回教”，有时也称为“回族”，所以本文题目沿用“回教”来指代伊斯兰教（穆斯林）；而下文中的“回教徒”是指日本对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人士的称呼。

⁵ [日]若林半，《回教世界和日本》，东京：大日社，昭和 13 年. 2.

⁶ 王柯，“日本侵华战争与‘回教工作’”，《历史研究》2009 年第 5 期，第 87-105 页。

⁷ 王屏，《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217.



早在明治末年，日本民间部分人士就对中国回教民族产生了“浓厚兴趣”¹。然而这种“兴趣”的产生，从一开始就不是出于宗教信仰，完全是出于官方目的，即实现其“国策”的要求²。进入20世纪后，日本政府和军部也开始行动起来，积极鼓吹要以中国“回教”为中心制定对华政策，即要求日本应该“树立回教政策为重要国策之一”。对此，日本矶谷廉介少将在谈及回教、回教徒、回教国家的回教民族以及宗教问题时，毫不掩饰地声称：“应从政治与宗教两方面加以观察，日本既欲为东亚之盟主，则对于树立回教政策为重要国策之一，殆无疑议”³。少壮派军人板垣征四郎少将对此也表现出了相同的观点。他认为，“以近东与南洋为中心之回教问题，对于日本之南进政策，应成为极重要考虑之议题，并应有以解决之。”⁴

在政府方面，陆相荒木贞夫认为，日本应以“确立根本的东亚政策为当前急务，其中树立恰当的回教政策又特别急切”。鉴于“回教徒”问题对于日本具有特殊性，他主张“通过拨发经费与扩大预算等方面着手支持从事回教政策之人士。”⁵为了进一步推动中国“回教”运动，日本内阁于1936年通过了《对中国实施策略的议案》。该《议案》指出，鉴于中国各少数民族大多分布在边疆，因此要**加紧“对边境的调查（如对四川、甘肃、新疆、青海等派遣资源调查队等等），借以实施分裂政策”**⁶。七七事变后，为了加快分化回教民族、灭亡中国的步伐，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一周年之际，日本五相会议又作出了关于《适应时局的对中国谋略》的决定，其纲要要点之一就是“推进回教工作，在西北地方划定由回教徒形成的防共地区。”⁷

总之，就日本利用中国“回教”阴谋来看，日本早已发现了中国回教民族的力量，因为无论它们所谓“东亚政策”“西进政策”还是“亚洲门罗主义”“大亚细亚主义”，都必要作一番联络“回教”的功夫，而“回教民族，素以东亚之西北角为根据地，其为事实所难磨灭之优点。旧政当权，对此非但加以藐视，且而时加以摧残。”⁸因此，当处心积虑对外侵略之日本认识到中国回教民族对于其实现“大陆政策”的重要性后，国内各界便着手组织各种团体、研究会，对中国回教民族问题进行调查研究，以服务于其对外侵略之国策。

二、调查研究中国回教民族，希图为其“国策”服务

在日本民间，着眼于中国回教民族问题者众多，“其中尤以黑龙会首领内田良平，及浪人会首领头山满为最著。”而对中国回教民族调查最为活跃的当属黑龙会的川村狂堂、涛秀成及浪人会的佐久间贞，他们三人在中国多年从事回教民族调查研究，有的长达三十余年；有的创办杂志，“倡导回民应以取得政权为前提，以权利为急务，以政府为攻击之目标”的蛊惑性宣传；有的鼓励回族同胞组织“大回回国”，阴谋肢解中国。⁹

¹ 据记载：明治33年（1900），日本黑龙会首领内田良平，与浪人会首领头山满共同策划于东京，派黑龙会川村狂堂由大连来华，经东三省到北平（在北平加入回教），经察、绥到内蒙，再由河套到新疆，返西安后，又到青海，再经河州（临夏）到兰州、西安，经汉中到成都、西康、云南，返回重庆后，经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福建，最后到达广东。历时三十余年，几乎游遍全中国，调查中国回教，研究中国回教种种问题。（杨敬之，《日本之回教政策》，上海：商务印书馆，1943年，第2页）。

² 自称穆斯林人的日本学者若林半，一语道破了日本各界对中国回族产生“浓厚兴趣”的实质。他说：“日本的回教政策，是皇家经略亚细亚的根干，于膨胀日本的发展上，在政治与经济方面有着不便明言的重要性”。（肖鲁，“日本对东方道德宗教的扒手行为”，《新华日报》1942-05-26（4））

³ 杨敬之，《日本之回教政策》，上海：商务印书馆，1943年，第5-6页。

⁴ [日]若林半，《回教世界和日本》，东京：大日社，昭和13年，4。

⁵ [日]若林半，《回教世界和日本》，东京：大日社，昭和13年，4。

⁶ [日]小林龙夫等编，《现代史资料8. 日中战争1》，东京：みすず书房，1965年，367。

⁷ [日]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东京：原书房，1969年，389~390。

⁸ 西北回教联合会会报编辑室编，《西北回教联合会一周年纪念号》（出版地不详），西北回教联合会本部，1940.15。

⁹ 杨敬之，《日本之回教政策》，上海：商务印书馆，1943年，第3页。



对中国回教民族地调查研究，日本政府及军部从一开始就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是因为日本对于“回教”地关注，原本就与他侵略亚洲的目的有关。¹ 明治 38 年（1905）5 月，樱井好孝接受外务省的秘密命令，前往新疆至蒙古一带地方进行旅行和视察，于次年 12 月返回日本，“行程约二万余千清里”。他在向外务省提交的报告中，详细记载了内蒙和新疆的地理位置，行政、交通状况，人种、居民成分，宗教信仰和商业物产以及气候等。² 1910 年，日本外务省调查员中久喜信周，对河南省的“回教徒”也进行了详细调查。³ 此外，在大正三年（1914），日本陆军大学毕业生若林九满也被派到中国湖南游历，要求他以湖南为中心广泛结交中国回教徒，鼓动中国回教徒活跃起来，以作为制定日后对中国政策的“资本”。⁴

而一向积极推行侵华政策的关东军自然也不甘示弱，1935 年 7 月 25 日，关东军参谋部提出《对内蒙措施要领》（绝密），为了达到分裂中国各民族的目的，其中特别规定“为了笼络回教徒，要仔细了解其风俗习惯，首先取得他们的好感，再给以必要的援助，终于促进满蒙回教徒的团结，努力设法利用集体力量。”⁵ 并于 1936 年 5 月关东军召开幕僚会议上，详细确定了《西北施策要领》，确定了利用回教民族分裂中国的阴谋。

日本参谋本部，对于我国西北情况也甚为注意，不断派出间谍公开或秘密前往回族集中聚居的西北地区进行调查。据《华北日报》报道，1934 年“四月期间共派四次，计一月派白田中佐、远藤主计，二月派谷菽，三月派川本少佐，四月派柴山、坂庭、西村。以上人员均领有公安局护照，其未领护照赴西北调查者甚多。”⁶

同时，一些著名的日本“支那回教”问题研究专家也在日本政府或军方资助下来到中国，“不辞辛苦”的奔赴中国各地进行调查研究回教民族问题。1935 年 9 月，著名“中国回教”问题研究者若林半在其弟子陪同下，花费两个多月，游历了中国中、东部地区的绝大部分的大、中城市，详细“调查中国的回族政策及状况，并与之进行联络”。然而此次“美其名曰”的调查及旅行费用却是来自外务省出的“补助费（500 元）”。⁷

在调查结束后，若林半详细阐述了日本与中国回教民族之间的关系。他认为，“现在日本、满洲国有百四五十万回教徒，中国有七千万回教徒，回教徒居住在一起，结成一大集团。制定中国的政策与对回教徒的政策之间具有奇妙之处，因为这是真正认识中国的证据。”⁸ 所以，他认为正确认识回教世界和制定恰当的回教政策，这对于日本“国策”来说是一件紧急重要的事情。因此他强烈要求“政府从速制定具体的对华回教政策，并要热心且忠诚的实行”，而且要“国民意志坚定，信心百倍，甚至认为为此付出生命也是理所当然的”。⁹ 与此同时，伪满洲国侍卫官长工藤忠君也以民间人士的身份曾在中国各地“长途跋涉”，精密调查研究“中国回教”，并成为了研究“中国回教”的权威者。他认为关于“中国回教”政策的研究要急切进行，不能怠慢，因为这是“事关国家的百年大计，应当不断努力推进。”¹⁰

可见，日本各界对中国回族进行调查研究的目的是，不仅具有“雷同性”，而且具有“煽动性”，

¹ [日]白桦陽，《殖民地政策学から地域研究へ》，王柯，“日本侵华战争与‘回教工作’”，《历史研究》2009（5）：第 89 页。

² [日]樱井好孝，《蒙古视察复命书》，明治四十年一月，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日本国立公文書館亚洲历史資料中心（JACAR）（<http://www.jacar.go.jp/chinese/center/center.html>）电子版，查询编码 B03050331800。

³ 中久喜信周调查，《河南的回教徒》，明治 43 年 10 月，[日]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JACAR 系统电子版，查询编码 B02130561900，B02130562000。

⁴ [日]若林半，《回教世界和日本》，东京：大日社，昭和 13 年，1。

⁵ [日]小林龙夫等编，《现代史资料 8. 日中战争 1》，东京：みすず书房，1965，494。

⁶ “参谋本部派员调查我西北”，《华北日报》1934-05-11(2)。

⁷ 王柯，“日本侵华战争与‘回教工作’”，《历史研究》2009 年第 5 期，第 90 页。

⁸ [日]若林半，《回教世界和日本》，东京：大日社，昭和 13 年，41。

⁹ [日]若林半，《回教世界和日本》，东京：大日社，昭和 13 年，2。

¹⁰ [日]若林半，《回教世界和日本》，东京：大日社，昭和 13 年，52。



其对中国回教民族的关注“原本就与侵略亚洲的目的有关。”因此，在日本各方看来，从事“回教”运动不单于宗教运动上有重大意义，举凡政治、经济、社会乃至外交上都有密切关系，因为“回教”从根本上可以说就是“中国的一个分裂因素，值得日本积极加以利用”。¹

三、建立各种“回教”研究团体与组织，研究、分化中国回教民族

鉴于中国“回教”问题与日本国策息息相关。因此在日本国内，首先是一些学者、半官方人士成立了“回教圈考研究所”及“大日本回教协会”等“回教”研究团体，对“回教”问题进行系统研究与宣传。

日本本来并无回教民族，它的宗教是大和教。但为了侵略中国的需要，日本全国上下却盛行着“回教”热。为系统研究“回教”，1938年4月，日本学界“回教”研究专家大久保辛次、小林元、松田寿男等在国内组织了旨在研究世界回教的“回教圈考研究所”（后改称“回教圈研究所”），并发行月刊《回教圈》。该研究所主要任务就是收集世界各国“回教”资料并进行研究，尤其对中国回教民族现状、国民政府对回教民族政策等问题进行系统研究。9月19日，以陆军大将林銑十郎为代表的陆军将领和黑龙会等右翼势力成立了半官方性质的伊斯兰教政策研究中心——“大日本回教协会”，出席该会开幕式的有林銑十郎、川岛义之两大将及小笠原长生子爵等官界财界人士200余名，近卫首相、贵众两议院议长皆送来祝词²。作为“调查和执行回教对策的专门机关”，该“协会”创办《回教世界》刊物对各国“回教”进行系统研究，其宗旨是融合“回教”诸国，为其军国主义所用。1939年11月“大日本回教协会”主持“回教圈展览会”时，又借机举办“世界回教徒大会”，以宗教感情联络世界回民。

除了部分学者及半官方人士组织的“回教圈考研究所”及“大日本回教协会”等回教研究机关外，最引人注目的是由外务省、陆军省以及海军省相关人员亲自组成的“回教研究会”（又称“三省回教研究会”）和“回教及犹太教问题委员会”，这两个“回教机关”的共同特点就是以“中国回教”为主要研究目标。

由于“回教研究会”与“回教及犹太教问题委员会”所具有的特殊军方背景，因而对于利用中国“回教”问题来服务于中日战争大局的作用就显而易见了。所以在这两个“回教机关”召开的历次会议上，报告内容的绝大部分都是关于中国“回教”的。今冈十一郎在“回教研究会”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就一语中的，强调指出了中国“回教”在与日本“国策”上的关系。他指出：“随着日支事变后形势的发展，今后我国将会实现从北支到内蒙，进入新疆，进而再进入中央亚细亚的大陆政策”，所以应该充分理解“回教”的重要意义。³而“回教及犹太教问题委员会”在1938年8月向内阁总理大臣提交的《关于树立回教对策的报告》中也再次强调中国“回教”问题对于中日战争的重要性。该《报告》强调指出，“与分布在亚细亚大陆回教徒建立友好亲善关系，足以确保从背后对支那进行牵制”；同时该“问题委员会”更是毫不隐瞒日本对“回教”的根本目的，即“在于获得回教徒最有力同情者的名分，以有益于对外经纶，尤其是帮助对英、对苏、对支那国策的顺利实施”；而“从现实来看，它还是建立处理支那边境问题根本对策的火烧眉毛的

¹ 1922年8月，大林一之（军方委托进行研究人员）在其所著的《支那的回教问题》中就其研究中国回教的目的写到：我认为，富于煽动性，并具有雷同性，在特殊地域里成为特殊潜在势力的支那回教，在现今的形势下就是支那的癌症。但是，除非到了支那自身被解剖手术切开之时，是无法将其剔除的。而因其病情发展缓慢，若没有来自外部的冲击就不会发生急激的病变。……因而，支那的回教，根据对它如何进行利用，可以使其在调整整个远东问题上发挥出一种有力的作用。（王柯，“日本侵华战争与‘回教工作’”，《历史研究》2009，（5）：89。）

² [日]回教考研究所编，《回教圈月刊》第一卷四号，东京：四海书房，昭和十三年十月，40。

³ 《回教研究会、外务省欧亚局第一课今冈嘱托报告》，昭和12年12月6日，[日]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JACAR系统电子版，查询编码 B04012533200。

紧急要务。”¹可见，这些“研究会”“委员会”就是日本“肢解”中国的重要宣传舆论机关。

此外，日本还在国内组织人员翻译古兰经，并大批印赠；开办经堂学习，招收中国回族学生，截止到1933年4月，就从中国招生了250余名回民留学日本²。1938年5月，日本在东京建筑一**政治性清真寺——东京清真寺**。在其落成典礼时节，便盛大招待世界回教代表，特别邀请伪满洲国皇帝溥仪的哥哥溥光夫妇“作为回教的坚定信仰者”，去东京代表“满洲国回教徒出席了东京回教礼拜堂的开堂仪式”³。一时间，“日本之与回教，回教之在日本，俨然呈现东方回教民族复兴迈进的中心势态。”⁴

与此同时，日本在中国占领区内也大肆策划成立各种“回教”组织，挑拨回汉民族矛盾，企图分裂中国。“九一八”事变后不久，日本扶植满族废帝溥仪在中国东北建立伪满政权，开启了利用中国少数民族分裂中国的先声。对于人口众多，占据重要地理位置且又与中亚、西亚各国具有相同宗教信仰的中国回教民族，日本“用心之笃，爱护之热，希望之真”，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因此，扶植、拉拢个别回教民族分裂分子，成立各种“回教”组织一时风起云涌。1934年2月17日，在日本顾问提议下，伪满洲国在首都新京成立了“伊斯兰协会”，这是日本在中国策划成立的第一个“回教”组织。“协会”成立后，由日人川村狂堂主持、管理满洲回教徒，他到处鼓吹“以回教为国家之重要分子，不特能为满洲健全之国民，抑且能为世界和平之领导”⁵，煽动回教民族独立建国以割裂中国。7月3日，日本关东军策划组织成立了囊括全东北的“满洲伊斯兰教协会”，在其成立一周年之际，在东北已有10个办事处，166个分会。⁶1936年11月，日本将“满洲伊斯兰教协会”改为“满洲回教协会”以利于其宣传。平津沦陷后，日本于1937年8月在天津策划组织“天津回教会”，10月24日又在北平策划组织“北京回教会”。为了加强各回教组织的联络，1938年2月7日，日本又策划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中国回教总联合会大会”，日本陆军特务部部长喜多诚一少将以及大使馆森岛参事参加，该联合会“最高指导者”是北京特务机关长茂川秀和。大会决定组织“中国回教总联合会”，于华北、西北、内蒙古、华中、河南、西南等地各设联合总部。在华北联合总部下，于北京、天津、济南、太原、张家口、包头设置区本部。⁷“中国回教总联合会”宗旨为“提倡东亚精神、积极进行防共”⁸。该“联合会”还于4月9日决定设立“回教青年训练所”，加强对回教民族青年的统治。在日本支持下，该“联合会”迅速扩张，仅仅一年时间，就成为一个拥有389各分会的庞大组织。⁹

此外，1938年11月，日本在张家口张罗成立“西北回教联合会”。在包头、广州、张家口、承德等地相继组织了“蒙疆回教联合会”“广州回教协会”“中国回教青年团”“西北回教民族文化协会”“防共回教徒同盟”等等“回教”组织。在教育方面，日本通过改组“西北学院”，创设“实践女中”等方式拉拢回教民族同胞实现“回民在建设东亚新秩序中的义务”。¹⁰总之，这些“回教”组织共同的宗旨就是：加强“防共阵线”，打倒国共两党合作抗日，拥护“友邦仗义兴师”，实现“中日共存共荣”。

¹ 《关于树立回教对策》，昭和13年8月，外务省记录，[日]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JACAR系统电子版，查询编码B04012533600。

² “日本野心”，《京报》，1933-04-4(2)。

³ [日]大日本回教协会调查部编，《回教要览》，东京：天一出版社，1943.48-49。

⁴ 唐震宇，“东亚新秩序与回教徒之自觉”，《回教月刊》第二卷第四期，1940-03.7。

⁵ “伊斯兰协会已批准成立矣”，《盛京时报》1934-02-18(3)。

⁶ 回教圈考究所编，《回教圈史要》，东京：四海书房，1940(1):300。

⁷ “中国回教联合会宣言打倒共产主义”，《盛京时报》1938-02-08号外(1)。

⁸ [日]回教圈考究所编，《回教圈月刊》第二卷第一号。东京：四海书房，昭和14(1).9。

⁹ 中国回教华北联合会总部，《中国回教联合会第一年年报》，第93页。

¹⁰ 唐震宇，“东亚新秩序与回教徒之自觉”，《回教月刊》第二卷第四期，1940-03.2。



四、网罗个别回教民族分裂分子“反苏”“反共”“反蒋”，妄想“共存共荣”

中国西北地区，在地理上与苏联接壤，是路陆连接中亚、西亚及苏联的重要通道，因此地理位置极其重要，可以说无论从国际上还是国内上来观察，实为决定东亚和平之关键。因此，通过“回教徒”和“回教工作”，向中国西北地区扩张，对于实现日本的“大陆政策”十分重要。所以，在七七事变爆发后不久，日本大本营陆军参谋部第二部就已经制定了一份《关于支那进行长期抵抗的情势判断》的军事机密文件。在文件中列举了很多条可以促使国民政府崩溃的策略，其中第六条为：“致力于怀柔西部内蒙古及西北地区的回教徒，扶植亲日反共反国民政府的势力，以阻止苏联经外蒙及新疆方面输送兵器和军需物资。”¹而“日本国际协会”也提出了类似的对于时局的对策²。因此，日本各界打着“共存共荣”的幌子，积极进行网罗、拉拢个别回族分裂分子的各种活动。

首先，日本各界打出“反苏”“反共”“反蒋”的口号，借以拉拢“西北五马”³为其所用。在日本军部和外务省内有一种说法，他们认为“回教徒”因其宗教信仰与汉族不同，因此“先天就是反共的”，而具有亲日感情。同时，日本认为具有强大实力的回教民族军阀，即“西北五马”与国民政府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易于拉拢。⁴为进一步分化拉拢马姓军阀，日本于1938年5月7日成立了“防共回教徒同盟”团体。在成立大会上发表的《伊斯兰教徒反共同盟宣言》中向“西北五马”呼吁：“位于支那边境西域的五马联盟应该与南方的土耳其遥相呼应，高举反共运动的烽火，切断苏联对支那的红色通道，击破蒋介石容共政策的最后抗日据点。在此基础上，我等回教徒同志以神国日本为盟主，为了亚细亚文明的复兴，为了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结成伊斯兰教徒反共同盟。”⁵

鉴于“西北五马”对于日本的“国策”具有如此重大意义，因此加强对“西北五马”的拉拢成为其对华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一方面，日本打着“回人治回主义”，软硬兼施，拉拢一些阿訇、教长等，要他们呼吁“‘西北五马’在友邦日本协力之下，建设西北回疆乐土。即以西北陕、甘、宁、青、新五省为范围，以全体回民为基础，以其部下为中心势力，拥戴一有利首领，建立一回族新式政权，而为东亚防共之一环。”⁶另一方面，重点拉拢掌握宁夏、青海命运的马鸿逵、马步芳。因为宁夏、青海地处北接蒙疆，东南与甘肃、陕西连接，前面是黄河，背靠贺兰山，地处西北交通要地。对于日本的“西进政策”具有举足轻重之地位。对此，日本驻沪总领事日高信六郎在向广田弘毅外相上报的电文中指出：“如果驯服了青海的马步芳，切断从哈密经兰州至西安的通道，就因此切断了苏联向汉口政府提供武器的道路，就等于掐住了汉口政府的命门。这件事不仅可以加快事变的解决，而且也可以阻止赤化势力依托这个通道东进，因此是一个十分切合

¹ 《关于支那进行长期抵抗的情势判断》，昭和12年11月23日，[日]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 REEL NO.A-0221. JACAR 系统电子版，查询编码 B02030548200.

² 1938年4月，“日本国际协会”提出了《对支时局对策》，其中第六项对策就是“推进怀柔边境民族及回教徒工作”。（王柯，“日本侵华战争与‘回教工作’”，《历史研究》2009，（5）：103.）

³ 所谓“西北五马”，此处是指盘踞在中国陕西西部、甘肃、宁夏、青海及新疆一带的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马步青、马仲英。他们都是回族且拥有军事实力的人物，他们支配着中国西北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大权，是决定中国西北命运的主要人物。因此，他们受到了日本的密切关注，对“西北五马”的起因、变迁、现在的动向以及国民政府对“五马”的联络工作都进行及积极地研究，妄图分化“五马联盟”及国民政府与“五马”的关系。（[日]外务省调查部编，《回教事情》第一卷第一号，昭和13年5月23日，14-24.）

⁴ 日本回教圈考究所编的《回教圈史要》中，对于“西北五马”与国民政府的关系就认为，“很明显，居住在支那西北角受马姓军阀统治的回教徒，未必会倾听按照赤化音符吹奏出来的抗日笛声。”（回教圈考究所编，《回教圈史要》，东京：四海书房，1940，293.）

⁵ 《第一八号（别电、部外极密）》，昭和13年5月9日。[日]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JACAR 系统电子版，查询编码 B04012550300.

⁶ 张洪涛，“西北于防共上之重要性”，《回教月刊》第二卷第一期，1939-06.14.



实际的措施。”¹

对此，广田外务大臣也认为应对于支那事变直接产物的“西北回教圈”，即“五马联盟”的动向应给予足够的重视。应该“利用宗教目的”来巩固“五马联盟”，使其从事“防共”“反蒋运动”。²而在日本的蛊惑宣传下，马鸿逵在其控制的“宁夏省回教协会”的会议上，每次报告的主旨皆是“防共”，在其制定的宣传口号上也每次都有“共产党是回教的敌人”标语，煽动回教群众仇恨共产党。³而一些受其迷惑的个别回教民族分裂分子也积极宣扬“反共”“反蒋”、响应与日本“紧密提携”、“共存共荣”等言论⁴。民族分裂分子张洪涛便是追随日本叫嚣的代表人物，他在《回教月刊》上发表了大量反动文章“大声疾呼”要联合“五马”势力，进行“反共”“反蒋”。他指出：“现欲求中共赤化势力根绝，则非捣其巢穴，断其联络不为功。西北既存有五马势力，且俱为反共之有力者，如能以宗教之关系，促其联合，加强‘回族势力地带’，而为铲共之中坚。盖如斯匪但阻断苏俄势力之前进，并可包剿中共于陕北一带。中共既除，‘赤色路线’塞而不通，则蒋介石政权定随此崩溃。如是，西北即可明朗，而东亚之和平不难以实现也。”⁵

其次，网罗、扶植个别回教民族分裂分子，组织各种“回教”团体，充当其“防共”工具。据当时日本人实地调查，当时回教民族人口占中国人口的五分之一，显然是一大势力，而且“回教徒”具有很强的团结力，因此事实上成为左右中国的重要“潜势力”。从中国的西北边境到西南边境都与世界回教的中枢相连，因此应该进行仔细观察和研究。在中国，“回教徒”主要分布的西北边疆，即新疆、青海、甘肃、陕西、山西、河北一带，因此“回教徒”应成为“防共”的坚强壁垒。⁶荒木文相在众议院会上对如何利用“回教”进行反共问题也进行了解释，他指出：“对于回教问题，回教信徒，数及数亿，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且其信徒在东洋特多，概努力于反共产主义，此为吾人深为关心之处”⁷因此，对于“目前积极防共上实居极为重要之地位”的回教徒上层分子极尽扶植、拉拢、分化之能事。

第三，日本在中国大肆宣传“回教民族”或推动“泛回教运动”，煽动回族积极“反共”，妄想利用回族结成一条“防共阵线”。所以，一方面，日寇在中国各地到处宣传“共产党是反对宗教的，我们回教是世界四大宗教之一，亦在被共产主义反对之列，所以我们亦要反对共产主义”⁸。另一方面，充分利用成立的各种“回教”组织，发行报纸、杂志进行宣传⁹。在“中国回教总联合会”会章中明确规定：该“总联合会”“对外主张中日满三国紧密提携，坚决反对共产主义”¹⁰。在“西北回教联合会”工作要旨中也有类似地规定¹¹。而且，为谋“日回亲善”，日本费尽心

¹ 《关于利用青海马步芳的密件》，昭和13年3月25日。[日]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JACAR系统电子版，查询编码B04012985200。

² 《本官发满苑电报第二十三号》，昭和13年5月9日。[日]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JACAR系统电子版，查询编码B04012550300。

³ 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主编，《宁夏三马》，北京：文史出版社，1988年，第200页。

⁴ 如日寇回奸刊物《回教》所载言论：“防共就是回教徒的使命。若实行防共，我回教民族须与日本紧密提携，共同图谋民族之发展，向堂堂正正的路上迈进。趁此时机，我回教民族团结一致，与友邦日本成一个生死线，庶乎东亚安定而礼教不亡也。……青年啊！赶紧觉醒吧！现在我们回教的复兴，是受友邦提携，将灭宗教的共产党替我们膺惩了，所以，信赖友邦保护，这是我们要知道的。”等等（《回教》.4.）

⁵ 张洪涛，“西北于防共上之重要性”，《回教月刊》第二卷第一期，1939-06.12。

⁶ [日]若林半，《回教世界和日本》，东京：大日社，昭和13年.51。

⁷ [日]《回教月刊》第二卷第二期，1939(7): 45。

⁸ 余振贵，《中国历代政权与伊斯兰教》，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第131页。

⁹ 据初步统计，日本利用“伪回教”组织创办的杂志有《回教》（后改为《回教周报》）、《回光月刊》《醒狮报》《伊斯兰旬刊》《回教》《西北钟声》《回教月刊》等等数十种之多。这些刊物中的文章都鼓吹“中日共存共荣”“反共防共”。仅据《回教》月刊第一、二卷共十一期的不完全统计，其中“反共防共”和为日寇侵略出谋划策的文章就达到75篇之多。（彭年，“日寇控制下的伪‘回联’”，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日伪统治下的北平》，北京：北京出版社，1987年，第300页）

¹⁰ [日]外务省调查部编，《回教事情》第一卷第一号，昭和13-05-23.96。

¹¹ 1938年11月，日本在张家口张罗成立了“西北回教联合会”。该会工作要旨：（1）率领西北全体回教民众，



机召集中国各地“回教”组织的上层代表人物参加在东京召开的世界回教徒大会第一次会议暨回教圈展览会。在日本顾问的帮助下，华北各地“回教”组织首脑及太原的教育家，西北的实业家共 12 位组团参加。为了显示对他们的尊重，在日本，他们被特意安排参观了首相官邸、文部省、海军省、拓务省、外务省、陆军省、商工省等处。¹ 同时，为标榜重视回族和伊斯兰教，挑选个别回族分子出任地方官。日军占领包头后，为实现其“西进政策”，特意挑选回族人金朝文担任包头市长，回族商人杨立堂为包头回教公会会长，不久又启用回族人蒋文焕担任西北保墙督办公署督办。此外也重用了韩梅亭之类的阿訇，以此笼络回教民族人心。²

第四，故意夸大回汉民族之间的矛盾，挑拨回汉关系。日本利用历史上回汉两民族之间的矛盾以及生活习惯风俗的不同，挑拨个人私争，离间民族感情，大肆宣传“回回并不是中国人”³“抗战是为了汉人”“抗战是为了蒋委员长”“援助回民自治”⁴等口号，企图鼓动回族群众脱离国民政府，组织所谓“回回国”，以遂其私图。全面抗战爆发后，日本侵略者又到处挑拨回汉两族之间的关系，对于回教同胞“施以诱惑离间藉以分化我抗战的力量与坚固统一的局面，以遂其‘以华制华’的野心”⁵。因此到处宣传“抗战是为了汉人”，而日本愿意“帮助回民自治”，实现回族的“自觉独立”；还利用回民信仰宗教的心理，打出了“尊崇回教”、“维护回教”、“提倡回教”的幌子，欺骗迷惑回族同胞，以此分裂回汉两民族之团结。⁶ 同时，鉴于当时国民政府否认各民族平等，而推行“大汉族主义”的民族政策，日本外务省则积极利用国民政府这一错误的民族政策，不遗余力地在其创办的《回教事情》杂志上大肆宣扬中国回汉两族仇视事件⁷。这种宣传就导致了个别不明事理的回教民族分裂分子利用日本的“防共”“反蒋”等政策，在回教民族群众间进行破坏抗日、投降日本的阴谋活动，给中国抗战造成了严重消极影响。

* * * * *

20 世纪上半期，中日两国处于严重对立时期。尤其是从“九一八事变”开始到抗日战争胜利期间，可以说中日两国一直处于战争状态。在这段时期内，国民党政府始终把回教民族当做中华民族中的一个宗族，把回教民族问题当做宗族问题对待，采取“采取大汉族主义”的同化政策，这就为日本利用回汉民族问题分化中国提供了契机。鉴于“‘回回穆斯林’是一个能帮助日本联系中国北方和内陆亚洲地区的集团”⁸，因此，以“制定恰当的回教政策为着眼点来考虑东亚全局的重大任务”⁹成为日本各界的共识。所以在 20 世纪上半期，日本各界为顺利实现征服中国，进而征服世界这一“国策”，便采取各种手段拉拢、分化回族同胞，挑起回汉民族矛盾，这就给

并联合世界教胞，使各大民族永远协和，与日本帝国及防共诸国，共维东亚和平。(2) 发扬回教固有文化道德，励行普及教育，使青年得到正确思想。(3) 与防共国家，及各大民族共同携手，勇往防共前线，一起灭此朝食，而维回教安全。(西北回教联合会会报编辑室编，《西北回教联合会一周年纪念号》(出版地不详)，西北回教联合会 1940, 1.)

¹ 丹子万，“日本回教展览会参加经过感想”，《回教月刊》第二卷第四期，1940-03.20.

² 吴懋功、王质武，“日军占领时期的包头回教人民 1937-1945”，包头市民族宗教志编修办公室、政协包头市东河区文史委员会合编，《包头回教史料》，无出版地址，1987-10.45.

³ 宁夏省政府教育厅，《宁夏回教教长战时教育问题讨论会专刊》第一集，宁夏省政府教育厅，1938-09.

⁴ 刘春，“日寇灭亡回回民族的阴谋”，《新中华报》1939-07-28(2).

⁵ 白崇禧，“动员回教精神”，《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会刊》第一卷第五期.4.

⁶ 刘春，“日寇灭亡回回民族的阴谋”，《新中华报》1939-07-28(2).

⁷ 据日本调查，自民国 21 年（昭和 7 年）11 月至民国 24 年（昭和 10 年）6 月，在中国内地先后发生了“南华文艺侮教事件”、上海“北新书局侮教事件”、河南“归德县回汉互斗事件”等等共 13 起回汉两族仇视事件。（〔日〕外务省调查部编，《回教事情》第二卷第一号，昭和 14 年 2 月 20 日，9~12.）

⁸ 〔日〕安腾润一郎，“Japan's 'Hui-Muslim Campaigns' in China from the 1910's to 1945”，《日本中东学会年报》。2003(18-2): 21.

⁹ 〔日〕若林半，《回教世界和日本》，东京：大日社，昭和 13 年.1.

